

## 滇西北多元宗教研究的文化意义\*

张泽洪

**提 要：**滇西北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砥砺共生。论文通过滇西北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族群、佛教各派在滇西北社会的浸润影响、滇西北社会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三个维度的考察，认为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多元信仰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文化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滇西北族群与宗教的多元共生，相互融摄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所致。

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滇西北 多元宗教 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 藏彝走廊

滇西北包括云南省大理州的云龙、大理、洱源、剑川、鹤庆、宾川、漾濞、永平，丽江地区的丽江、宁蒗、永胜，迪庆州的中甸、德钦、维西，怒江州的兰坪、泸水、福贡、贡山，保山地区的保山、腾冲等地，是西南边疆多元民族宗教最具典型性的地区。滇西北世居少数民族有藏、白、彝、傈僳、纳西、普米、回、怒、独龙等，历史上有阿吒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等多元宗教并存。我们拟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视野，从茶马古道经济文化传播，藏彝走廊民族迁徙的多维视角，来探讨滇西北多元宗教的内涵与特质。

### 一、滇西北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族群

地处藏彝走廊南端的滇西北地区，历史上是西南民族迁徙的孔道，形成多元族群汇聚之地。滇西北地处中原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板块的边缘地带。又处西南六江流域南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北纵贯全境。史称“维西地处极边，为西藏出入门户，山高路险，介金沙、澜沧两江之间，延袤宽广环境约二千余里，实为滇西阨塞要害之区”<sup>①</sup>。南北纵向排列的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构成滇西北特殊的生态环境，形成西南边疆

最具特色的地理单元。

连接中外的南方丝绸之路，滇西北的茶马古道既是商业贸易的通道，更是历史上宗教文化传播之路。丝路与茶马古道沿线驿站的开通，各族群人员往来的频繁，促进了滇西北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滇西北的永昌、维西，历史上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所在。清周化凤《修辟永昌道路碑》：“且永郡僻处天末，内卫滇西各郡，外控缅甸诸彝，盖西南之通衢，而永昌之要路。”<sup>②</sup>维西是滇藏道出入西藏的门户，也是丝路与茶马古道所必经的重要驿站，清代维西至奔子栏、阿墩子的驿站畅通无阻。清谢圣纶《滇黔志略》卷14载：

乃由金沙江至所属奔子栏、吉咱、丁拉等处，则有一十八站之远。又由澜沧江至所属阿墩子、梅里树、牛马甲浪等处，则有一十四站之远。<sup>③</sup>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35载：

维西厅，一在阿墩子，距城北八站，……一在奔子栏，距城西北八站。<sup>④</sup>

明清时期川西藏区连接滇西北的道路畅通无阻，此道可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支线。清光绪《西藏图考》卷4《诸路程站附考》“自巴塘经云南中甸厅至丽江府路程”说：

此间有两道。一由巴塘西行，至竹巴

笮，过河九站，至阿墩子，又十站至云南属之维西厅，皆行金沙江之外。一由巴塘南行，经六玉、奏堆，至云南属之中甸厅，皆行金沙江之内，较近数站。<sup>⑤</sup>

中甸旧称建塘，藏语称“建塘宗”，与川西藏区的巴塘、理塘合称为“三塘”。由于明代“三塘”属木氏土司控制地区，因此此路实际沟通了滇藏道与川藏道。

中甸以下的丽江、大理，历来是滇西北交通枢纽。丽江位于滇西北高原金沙江上游，为滇藏之间的咽喉要地，它的北部和中甸藏族地区相接，南部和大理白族地区相连。居住在这里的族群以纳西族最多，其次是汉、藏、白、傈僳等。清倪蜕《滇小记·藏程》就说：“而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sup>⑥</sup>丽江地处滇西北交通要道，历史上有滇西藩篱之说。清康熙《剑川州志》卷9载：

剑之圯有丽江，为滇西藩篱，与吐番接壤，而无城池可守，我朝开疆，已于鹤府设镇，分防石鼓。<sup>⑦</sup>

清倪蜕《滇小记·藏程》具体记载滇西北通西藏三条道路说：

西出有江内、江外及危习等三路，而三路内，又各有分投之路。盖自元明以来，西戎即叙，而丽江木氏又有以控制之故，底把、中甸、江外之途坦然无阻，其宗、拉、髻、江内之路荡荡通行。<sup>⑧</sup>

丽江是连接西藏的交通要道，而大理作为南诏大理国都城，历史上是滇西北政治经济中心。明杨慎《大理府志序》称：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缘洱水，出罢谷，为西南巨浸；浸苍山，像灵鷲，为西南巨镇。而襟带，而岩险，而物华，而人英，又衰然育，焮然燹，犁然有当于中土之奥区，卓乎无谢于南溟之奇甸焉。<sup>⑨</sup>

清康熙《大理府志序》：

夫叶榆为南诏都会，北接吐蕃，西南通交缅甸。点苍、鸡足，雄峙于中；黑水、金沙，联络于外。前抚昆弥，则崇冈峻壁，鸟道羊肠，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右联金齿，左带丽江，则番彝杂处，藉其力足以强，获其利足以富。以故酋长之雄，乘间窃取，战中国之兵，疲天下之力，而莫可谁何？<sup>⑩</sup>

又云：

滇迤之西，称山水之胜者，莫过于大理，东有若水九岩，南有昆弥铁柱，云龙黑水扼其西，铁桥石门镇其北，一雄郡也。<sup>⑪</sup>

滇西北东部的大理，南诏大理国以来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史称“大理为滇西巨镇，四会之冲。国初，南郭外为馆，以待迎送宿息”<sup>⑫</sup>。明代大理商务殷繁，人文荟萃，确乎是西南边疆一大都会。

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区域，毗邻西藏和四川，界连缅甸，邻近印度，是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国际的重要地段，梵僧传教南诏大理国就是走此重要通道。地处藏彝走廊最南端的滇西北，历史上又是民族迁徙流动的大通道，西南氏羌族群在此走廊的迁徙活动最为频繁，各族群丧葬仪式《指路经》指引先祖灵魂回归祖地的程站，昭示出先祖沿滇西北民族走廊的迁徙历史。滇西北地区的族群构成情况，我们以维西、丽江、中甸为例说明。民国《维西县志》卷2载境内民族构成及分布说：

我邑种族，考旧志以麽些、古宗、喇妈、龙巴、喇嘛、栗栗、獐子、獠子等为八种。麽些居城外亦村及河边沿江一带。古宗居在奔子栏、阿敦子两区。喇妈、龙巴、栗栗三种，散居河边江边山头。喇嘛概在佛寺，乃古宗、麽些两种人之为之。怒人远在怒江，獠人远在獠江，各有地。如诸语言习惯。<sup>⑬</sup>

麽些即纳西族，古宗即藏族，喇妈为白族支系，栗栗为傈僳族，獐子为怒族，獠子为独龙族。其中，维西的纳西族支系为“玛利马沙人”，维西的白族支系今称为“那玛人”，龙巴为尼西人，中甸自称为“龙巴”的尼西人，意思就是“河谷人”。

清光绪《丽江府志》卷1载丽江的民族有么些、西番、古宗、獐獐、怒人、猫子、獠人、猓猓、夔人等。<sup>⑭</sup>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人部·丽夷》载丽江的族群构成说：

丽郡夷人有九种，如民家、白夷、鲁保之类，散处各乡。山外江外，则獠人、怒子、生、熟獐獐四种，已远于人类，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之风。中甸、维西皆古宗，地近藏，服饰似喇嘛，人最黠。至郡城左右，则摩莎也。<sup>⑮</sup>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四十四年（1779），吴大勋出任丽江知府，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写就《滇南闻见录》。所载猫子即苗族, 夔人指丽江属于百濮、百越的族群。而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为居于澜沧江、怒江之外的族群。

民国中甸县的人口构成, 史称有汉族、回族、藏族、摩些族(纳西族)、力些族(傈僳族)、猓彘族(彝族)、苗族7种, 而汉族人多系中原迁徙移民。民国《中甸县志稿》卷上载:

中甸汉族有陕籍、赣籍、湖广籍、川籍、滇籍诸种, 其一部分系为绿营弁兵之苗裔所繁衍, 其余则为贸易、开垦、游艺而来。……总计全县七种民族共六千三百五十九户, 男女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四口。<sup>⑩</sup>

滇西北的少数民族以氏羌系为主, 亦包括苗瑶系的族群, 元明清时期迁徙进入的回族, 更有明代以后大量来自中原的汉族人, 这里是西南边疆最具典型性的多元族群分布之地。时至今日, 在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 就有藏、傈僳、纳西、汉、白、回、彝、苗、普米等9个千人以上的民族和其他16种少数民族。

滇西北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的显著特点, 是藏传佛教在云南康区的长期浸润影响, 所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 在滇西北地区的历史人文呈现, 都与藏传佛教的存在和社会影响有关, 以致清代史籍考察滇藏路的驿站, 沿途藏传佛教寺庙及僧人都是避不开的话题。清光绪《西藏图考》卷4《诸路程站附考》载:

竹挖根红教寺, 宿寺, 有喇嘛三百余名。喜经堂、佛殿颇庄严。……左往阿墩子八站, 前往德绒四站, 右循小沟而进为中甸路。次日行三十里, 一路碉房, 俱然烟以示敬。……中甸宿, 自巴塘至中甸, 行十八日, 约计一千余里。中甸抚夷同知所辖, 幅员三百余里, 夷民言语, 与藏地不同。所奉红黄二教, 城外有大寺, 刺麻二千余名。<sup>⑪</sup>

总之, 地处藏彝走廊南端的滇西北, 是多元族群迁徙分布交融的地区, 这里多元宗教文化的生成, 在西南边疆更是具有典型意义。

## 二、佛教各派在滇西北社会的浸润影响

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滇西北茶马古道的经济交往, 各族群在藏彝走廊的迁徙, 有助于儒释道三教在滇西北地区的传播。滇西北各民族传统宗教在此文化交融的过程中, 都不同程度受到中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 而滇西北藏、彝、白、纳西、普米、傈僳宗教文化互渗的趋势至为

明显。

滇西北各族群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在高原上居住着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 居住在金沙江河谷与丽江盆地的是信仰东巴教的纳西族; 在高原与河谷、低地间的山坡上, 居住着信仰“夷教”的彝族和信仰韩规教的普米族; 在南部山区与河谷中, 生活着信仰传统宗教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 在东南部山地与盆地中, 生活着信仰本主的白族。甚至不同宗教在同一族群中长期传播, 如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有达巴教的原始宗教信仰, 但历史上也接受了藏传佛教; 大理白族人崇拜“本主”, 但也先后接受阿吒力教、汉传佛教。

### (一) 汉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影响

从南诏大理国时期开始, 阿吒力教、汉传佛教就已传入滇西北。对于汉传佛教在滇西北的兴盛状况,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有生动的叙事:

然而此邦之人, 西去天竺为近, 其俗多尚浮屠法, 家无贫富, 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壮, 手不释数珠; 一岁之间, 斋戒几半, 绝不茹荤饮酒, 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 不可殚记。<sup>⑫</sup>

明谢肇淛《滇略》卷4《俗略》说:“叶榆以西, 接壤竺国。故自唐宋以来, 崇奉释教, 日甚一日。”<sup>⑬</sup>此论所载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释教, 指阿吒力教和汉传佛教。清康熙《云南通志》卷26《仙释》说:“滇西可达葱岭, 上世摩腾、竺昙时游斯地, 故其俗尚浮屠。”<sup>⑭</sup>这些记载都强调滇西北佛教兴盛原因, 是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作用。

历史上汉族移民的迁徙进入, 也是滇西北汉传佛教兴盛的原因。洱海周边地区的宾川鸡足山、大理点苍山、祥云水目山、剑川石宝山、鹤庆龙华山、洱源标山、兰坪金鸡山、永胜灵源箐等汉传佛教名山的形成, 就与汉族移民有关。故时人有“妙香国为神僧灵迹, 鸡足山为迦叶道场”<sup>⑮</sup>之说。史称苍山有五百寺, 而鸡足山大小庵刹千计, 僧众以数万计。大理国天开十六年(1220)立《皎渊塔之碑铭并序》载大理国高氏之族高泰明曾孙皎渊出家为僧, 有“达摩西来之旨, 祖祖相传, 灯灯起焰, 自汉暨于南国, 代不失人”的赞语。<sup>⑯</sup>石宝山是滇西北汉传佛教胜地, 明李元阳《游石宝山记》载所见石宝山佛教石刻造像说:

剑川石宝山, 缘崖多石像, 有观音, 有诸菩萨、罗汉, 皆若雕缕, 然及省其手足指

爪剥折之处，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之其为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凿痕。反覆辨别，莫究端倪。<sup>⑧</sup>

石宝山石窟和摩崖造像彰显佛教的传播，开凿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石窟造像，使石宝山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誉。永胜灵源箐石刻观音像，为滇西北佛教神像之较古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北胜州古迹曰：“石刻佛像，本州东山下石壁间，有古时镌刻释迦、观音二像，其旁题曰：‘唐吴道子笔。’”<sup>⑨</sup>史称灵源箐香火之盛，为永北之冠。

## （二）滇西北白族佛号命名所见佛教的影响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人流行佛号命名习俗，这是佛教影响滇西北民间社会的结果。清道光《云南志钞》卷7《土司志上·大理府》载明代浪穹县王氏家族的王药师生、王药师恭、王药师保祖孙三代仕宦行迹，并评价说：“其时俗尚佛教，人名多冠以佛号。”<sup>⑩</sup>所谓佛号命名，是信徒将修炼的“本尊”之名加入名字中，以象征希望达到的修炼境界。即在世俗姓与名之间加上佛号，如南宋大理商人李观音得，其中“观音”是其佛号，即他修炼的“本尊”。云南地方史籍所见佛号命名者有高妙音护、高观音政、高逾城隆、段易长顺、杨天王长、张药师莲、段易长兴、赵般若宗、段延寿姐、董伽罗尤、李大日贤、张药师王明等，这是白族信众表达佛教信仰的特殊方式。

白族佛号人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大理”条曰：

乾道中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议市马。……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银字相间。邕人得其《大悲经》，称为“坦绰赵般若宗祈祷目疾而书”，坦绰、首望、清平官，皆其官名也。<sup>⑪</sup>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故□记姚安奉议大夫杨公惠武墓志铭》载：

孝男将仕郎金堂县主簿杨鼎，媳何观音婢，次男杨春，媳彭观音桂；孝孙杨保、杨贤、□□；孙媳李观音香、杨观音修；孙女法华圆、法华芳、法华息、观音才、观音和；孝女观音□、观音玉；婿杨寿段□；孝孙昭信校尉百户杨珠，孙婿杜坚、杨顺；外孙杨德春、李玄岱、段观成；外孙女妙祖、春花好、冬菊花立。<sup>⑫</sup>

此碑文的题名中共列杨氏家族25人，其中采用佛号“观音”、“法华”者有11人，显示杨氏家族女性多为信佛之人。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指出：“白子婴儿，弱病难养，则请巫师举行一种仪式（富豪则请阿叱尼，仪式较大），向神佛寄名。巫师假神佛之名，赐婴儿名字。此名字必含所寄名之佛或神之称号，最下一字，多为生、光、明、保、安等字样。”<sup>⑬</sup>

历史上白族人名夹佛号计有观音、逾城、药师、般若、金刚、大日、天王、文殊、妙音、易长、随求、法华、华严、三宝、难陀、圆通、诸天、天神、普贤、梵僧、大师、和尚、左梨、普法、大藏、延寿、婆罗、舍利、玄化、佛、吉祥、弥陀、释迦、迦罗、波罗等36种。<sup>⑭</sup>方国瑜先生亦认为：“其时俗尚佛教，人名多冠以佛号，所说甚是。而佛教宗派以密宗用佛号为名者多，今之康藏如此。”<sup>⑮</sup>此佛号命名可谓是信众宣示信仰的象征符号，是佛教影响白族民间社会的典型例证。

## （三）滇西北的苯教与噶玛噶举派

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地区的传播，早期是苯教与噶玛噶举派共存。吐蕃在公元7世纪中期左右进入滇西北，苯教也随吐蕃军队的行动而传入南诏。进入滇西北地区的苯教，经历长期传播形成控制区域。民国时期《三省入藏程站纪》记载说：“自龙树塘历阿敦子，多木沿江行五十里至桥头。……渡桥至澜沧江西岸，为黑喇嘛所属地。”<sup>⑯</sup>所载澜沧江西岸为黑喇嘛即苯教地盘。德钦、中甸、宁蒗等地称苯教为黑苯，地方志中亦称之为黑教。民国《中甸县志稿》卷下称：“中甸在前明中叶，喇嘛教即已盛行，惟其时仅有红教，亦间有奉行黑教或白教者。”<sup>⑰</sup>

成书于清嘉庆九年（1804）的《西藏纪游》载：“近云南边界尚有黑教喇嘛，另为一种，与黄教争上下。”<sup>⑱</sup>明清时期滇川康区的黑教寺庙和僧人众多，其社会影响力不可小觑。

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下《风俗》载夷民：“土人家家供佛，信喇嘛僧。”“俗尚古朴，惟好佛信鬼。”<sup>⑲</sup>明代滇西北藏传佛教兴盛，形成家家有佛堂，村村有经堂的信仰格局。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丽江木土司迎请第八世噶玛巴”条载：“丽江木土司（vjang-sa-tham-rgyal-po）也请求法王住锡于其地，福田和施主共同主管政教两方面之大业。”<sup>⑳</sup>木氏土司与噶玛巴八世活佛米觉多杰在丽江的会晤，是纳西族接受藏传佛教的

重要事件。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推崇噶玛噶举派，所谓“么些则只奉红教”即指此。清余庆远《维西见闻纪》载：

红教喇嘛，相传有十三种，维西惟格马一种。格马长五人，谓之五宝，轮回生番地，均十余世不灭，人称活佛。维西五寺，红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马四宝喇嘛之法子也。<sup>⑤</sup>

维西五寺，指红教的寿国寺、兰经寺、达摩寺、来远寺和奔子栏的荣宣寺。滇西北流播的噶玛噶举派，云南地方文献多概称红教。清道光《云南志钞》卷6《边裔志下·西藏载记》载明代中甸“其红教又分二派：一曰当览派，又称打览建，有承恩、报国、恨呼、普恩四寺；一噶嘛派，共建二十五寺”<sup>⑥</sup>。

元明时期控制滇西北的木氏土司，历史上以崇奉佛教而知名。《明末滇南纪略》卷3《沐公顺贼》称：“丽江土官自明朝开国以来，惟以一檄而定，素不知兵，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之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养。”<sup>⑦</sup>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木氏》说木氏土司，“崇奉佛教，所在营建寺庙，极其华丽，有藏经楼，贮藏经全部，经文皆楷书”<sup>⑧</sup>。木氏土司崇奉噶玛噶举派的举措，是在丽江、维西兴建红教十三寺，即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福国寺、玉峰寺、林昭寺、喜化寺、答来寺、寿国寺、来景寺、普化寺、达摩寺、来远寺。其中福国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玉峰寺又合称为丽江五大寺。而其中最早兴建的福国寺，在明万历年间又经历了从禅林到藏传佛教寺庙的转化。

#### （四）清代滇西北格鲁派的兴起及藏传佛教高僧

藏传佛教在滇西北藏族、纳西族、怒族、普米族、摩梭人、玛丽玛萨人等族群中有不同程度的传播。至清代由于统治者的支持，滇西北经历了红教、黄教的嬗变消长，格鲁派取代噶玛噶举的独尊地位，成为滇西北藏传佛教后来居上的教派。但尽管如此，红教则依然顽强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最终形成藏传佛教各派共存的格局。清谢圣纶《滇黔志略》卷14谈红教、黄教的关系说：

红教则四宝法王统之，其势弱；黄教则大宝法王统之，其势强。余任维西所属，有兰经、寿国二寺，则红教喇嘛所居。有东竹林寺，则黄教喇嘛所居。……维西红教约百

余人，黄教则有五百余人。邻境中甸黄教一寺，至有千余人之多。<sup>⑨</sup>

民国《中甸县志稿》卷下载：

迨前清康熙己未年经达赖五世，奏请朝廷剿灭红教，崇尚黄教，奉旨建归化寺，敕赐度牒三百三十本，剃度黄教喇嘛三百三十名。准在中甸境内打鼓念经，宏扬红教。旋又请准予归化寺额设黄教喇嘛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年给口粮、酥油、盐、茶、银两等物。<sup>⑩</sup>

清乾隆时期中甸归化寺额定喇嘛1226名，至建国初期归化寺还有1329名喇嘛的规模。

明清时期滇西北藏传佛教有一批高僧大德，他们笃志修行的灵异事迹载入地方史册。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下载：“太极庵，在芝山巅，僧得天、的敬、的痴习静处，景最清幽。”<sup>⑪</sup>“的知，喇嘛僧，自幼入芝山修行，即与象异，未几退居山岭太极庵，每日默坐持念，不履城市，五十余年，鹤发童颜，喜笑自若，见人略无烦恼，意隆冬大雪，露肘袒肩，一如常时。四宝法王及西域高僧来叩其所得，皆敬礼之而去。”<sup>⑫</sup>在芝山太极庵修行的的知是噶玛噶举高僧，其修行成就获得噶玛噶举最高领袖四宝法王的尊敬。

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下《仙释》载清代西域僧阿哈哈摩尼的神异事迹。“初至丽，往来雪山麓，以石结茆，终日兀坐，夷象伺之，每夜跌坐石龕，喃喃持梵咒。晨起取清泉灌其体，自顶及踵，虽严寒日必三焉。鹤发童颜，步履如飞，或叩以导引术，笑而不言，神色清润，年已百余岁矣。后往鹤庆，住锡东岳宫。”而另一高僧处音都知，“顺治己丑年，自西藏来，住锡解脱林，为四众说法。”<sup>⑬</sup>中甸归化寺亦有“经典深湛、修持严谨”的名僧。<sup>⑭</sup>

### 三、滇西北社会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

滇西北阿吒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东巴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原始宗教多元共生，其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的格局由来已久。滇西北纳西族东巴教与苯教的文化互渗现象明显，是历史上藏纳文化长期交融所致。永宁民间达巴教的达巴和藏传佛教的喇嘛常共同行法，如纳西人的丧葬由达巴主持“开路送魂”“洗马”仪式，而藏传佛教的喇嘛则念经做点火仪式。<sup>⑮</sup>怒族支系阿怒人居住的丙中洛，是怒江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的典型，藏传佛教、少数民

族传统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在此都有影响。

### (一) 道教在滇西北地区的传播影响

明代木氏土司尊崇道教的举措，是在丽江兴建吴烈山神庙、束河九顶龙王庙、束河大觉宫、七河大王初神庙、九河神庙、县城玄天阁、白沙真武祠、白沙大定阁、芝山巅太极庵等。清光绪《丽江府志》卷4《寺观》说：“丽江接壤西域，佛寺颇多，道观次之。”<sup>④</sup>丽江壁画作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束河大觉宫绘制有9堵壁画，绝大部分是道教题材。丽江的大宝积宫有12堵壁画，其中最大的十二号共100个神祇，中央画释迦牟尼，上列十八尊者，两侧画道教神仙。大宝积宫二号167位神祇，有道教的三清、二十八宿、龙王、雷部诸神仙。大宝积宫十一号共18神祇，有道教天、地、水三官、文昌、玄天等神仙。十六号则绘有道教神仙14位。

丽江壁画的内容揉合道教、佛教显宗、密宗，其题材多元化与丽江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相关。丽江各族群之间保持着亲密关系，纳西族著名长诗《创世纪》说同一母亲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是藏族，老三是白族，次子是纳西，称：“一母生出三种人，三兄弟说三种话，三个民族同祖先。老大是藏族，居住在上边；……老三是白族，居住在下边；……次子是纳西，居住在中间。”<sup>⑤</sup>丽江道教题材壁画的创作，是木氏土司尊崇道教的结果。清光绪《丽江府志》卷1《风俗·节令》载：“九月上旬，道士朝真，村人络绎进香者凡九日。”<sup>⑥</sup>说明道教信仰已融入民俗活动之中。

清代巍山道教进入兴盛时期，其时山上兴建的道教宫观有文昌宫、主君阁、玉皇阁、斗姥阁、清霞观、三皇殿、观音殿、元极宫、培鹤楼、含真楼、道源宫、云鹤宫、长春洞，以及祭祀土主的嵯耶庙、巡山殿。<sup>⑦</sup>云南巍山道教至明清以来，形成了斋醮敬香的民俗活动。民国时期巍山的巡山会、老君会、南斗会、北斗会、巡山老祖会、财神会等会期，在民间都颇具影响。<sup>⑧</sup>道教色彩的洞经会在滇西北白族、纳西族社会都很盛行，洞经会庆祝道教神仙诞辰，念诵的经书是民间传布的道经。滇西北白族民间的莲池会，神灵会期以供奉道教神仙为特色，是道教影响滇西北白族社会的典型例证。

### (二) 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

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更有长期的传承和

深厚的土壤，纳西族东巴教、普米族韩规教、白族本主教、彝族毕摩教、傈僳族尼扒教、普米族韩规教。而各族群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多元的，如在滇西北普米族民间社会，就是藏传佛教、释比教、韩规教多元共生的格局。民国时期周汝诚《宁蒗见闻录》就说：

永宁境内之宗教比较多：本地土司和吕喜信喇嘛教和达巴教；么些信东巴教；彝族信碧玛教；傈僳族信尼扒教；西番族信奉扈第叭教。在这民族众多的社会里，信教比较自由。永宁各少数民族各有其宗教，及其心理和信仰。<sup>⑨</sup>

周汝诚所载本地土司即民国时期永宁土知府阿氏土司，阿氏及称为“吕喜”的摩梭人信仰藏传佛教和达巴教。宁蒗的么些即纳西族信仰东巴教，宁蒗的彝族信碧玛教即毕摩教，傈僳族有尼扒教的原始宗教信仰。西番即普米族信奉扈第叭教。永宁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纳西族的东巴教就有2000多位神灵，传世至今的东巴经有两万册左右，其中不雷同的经书约有1500部。而滇西北彝族的毕摩教，保持着大凉山彝族的仪式传统。

滇西北社会的民间信仰，也保持着与中原地区相同的习俗。清咸丰《邓川州志》卷4《风俗》载：

余则尊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十室之邑，必择地营殿宇，恭值诞其牺牲虔祭。而文昌洞经会，里巷间尤加意整饬，各立社规。凡道家所谓神诞日必肃衣冠，就祠庙部署经坛，讽诵竟日。<sup>⑩</sup>

云南白族农历七月半做中元会，在本主庙设皇坛、经坛、亡坛，由道士主坛行荐亡拯孤活动，说明白族传统宗教的本主信仰，又融摄道教元素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信仰。民国《维西县志》卷1《坛庙寺观》所载民间信仰祠庙有：关岳庙、文昌宫、万寿宫、东岳宫、三清殿、财神殿、维安阁、奎星阁、西岳庙、城隍祠、北龙庙、龙王庙、三霄殿、忠烈祠、川主宫、三圣宫、忠烈祠、先农坛。来自中原的有着道教色彩的民间信仰神灵，成功进入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显示中华文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凝聚力。宗教对凝聚西南边疆各族群起着重要的整合作用，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神学宗教多元共生，为宗教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中国

特色的田野例证。

(三) 滇西北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共生局面的形成

滇西北是多元宗教文化交汇之地,藏传佛教在藏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怒族中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丽江纳西人有原始信仰的东巴教,但藏传佛教在纳西族中的传播,可谓是影响多元族群的典型例证。清余庆远《维西见闻纪》载纳西族“头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sup>⑤</sup>。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人部·转世》亦载:“丽之夷人,凡有两三子,必令一子为喇嘛。”<sup>⑥</sup>清乾隆八年(1743),维西其宗么些头人之7岁的儿子达机,被噶玛噶举派选定为活佛,“远近么些闻之,百千成群,顶香皈依,布施无算”<sup>⑦</sup>。乾隆丁亥年(1767),噶玛噶举派四宝法王命喇嘛数人来维西六村纳西族王永善家迎请其子为噶玛噶举派活佛,“六村么些闻,皆赴免冠拜”,其子后成为“格马四宝喇嘛之高第弟子”<sup>⑧</sup>。历史上不乏纳西人信仰藏传佛教的记载。民国《中甸县志稿》卷末《方外》载江边境北地甲摩些族人鲁苴宜吗,“乃入归化寺为喇嘛,精研黄教教义,后进藏留学三十五年,凡三藏大乘经典,无不通晓,屡考得格协学位”<sup>⑨</sup>。

元明时期伊斯兰教随回族迁徙传入滇西北地区,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近代以来天主教、基督教相继传入滇西北地区,而滇西北各族群仍保持原始宗教信仰,由此形成多元宗教相融共生的格局。明隆武《重修邓川州志》卷3《风境志·风俗》说:“密僧叱龙教早;道士驱雷逐疫,皆有天功。若二月八日迎佛,四月八日浴佛,九月朔至九日拜斗,皆自唐代以来,仪文尚奢,而敬念可取。”<sup>⑩</sup>清代维西县有滇西副军刘德成《三圣宫碑记》曰:“三教之兴,洋溢中外。维西虽极边塞,而讽经祝国供佛向善者甚不乏人。如城中三圣宫,自有义张都督创始,数十年来,优昙零落。阐道无闻,几几乎有钟寂鼓寞之势。今幸官绅士庶共襄善举。重修庙宇,再绘金身,诚为佛门,光辉其色。”<sup>⑪</sup>民国《中甸县志稿》卷下载:“佛道混合教,凡县城及第三区江边,汉族人民均崇信之。非其先有佛道混合教之见解与目标而后立教,实本中国人见像必拜,见庙必礼,见经必读之相沿习惯。”<sup>⑫</sup>明清以来的滇西北地方志,客观反映多元宗教并存的历史实况。

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下《寺观》载观音

阁、福国寺、太极庵、观音堂、玉峰寺、金刚殿、护法堂、雪嵩庵、迎仙楼、西园庵、真武祠、大觉宫、元天阁、元光寺、九顶龙王庙、万松庵、兜率园、三宝庵、指云寺、文峰院、大王初神庙、九河神庙、迷刺瓦神庙等,显示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神祠在丽江并立。

民国《泸水志》记载基督教初传怒江泸水县的情况:

自民十八年春,有龙陵县人民来泸赶沼塘会,与夷人结合,用英文字母编成夷语传耶教。自后有美国教士贝牧师者,来泸借民房暂住,夷民入教逐渐增。十九年,向老窝土司属之驼基住民买有屋基一块,近已修成木板房,成为教堂。……每一星期,附近三四十里者,俱来集会一次。教长贝牧师,学校每村设一校,入教人数全区在三百户以上,概系獠獠,他族入耶教者无一人。<sup>⑬</sup>

怒江流域傈僳族信仰原始宗教尼扒教,近代以来又接受了基督教、天主教信仰。滇西北怒江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都是受基督教传播影响的族群。滇西北多元宗教相融共生格局的形成,也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长期孕育、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 结 语

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滇西北茶马古道的经济交往,各族群在藏彝走廊的迁徙促进了儒释道三教在滇西北的传播。滇西北各民族传统宗教都不同程度受中原儒释道三教影响,而滇西北藏、彝、白、纳西、普米、傈僳宗教文化互渗现象至为明显。历史上多元宗教文化在滇西北各民族间的交流,在信仰的层面将促进各民族的认同感,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说,滇西北多元宗教历史与现状的生成,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心愚)

\*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与南岭走廊文化建设研究”(2018skzx-pt08)、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比较研究”(skqy20176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滇西北多元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15JJD730001)阶段性成果。

① [乾隆]《滇黔志略》卷14, [清] 谢圣纶纂: [乾隆]《滇黔志略》,清乾隆间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② [康熙]《永昌府志》卷25, [清] 罗伦修,李文

- 渊纂：[康熙]《永昌府志》，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 ③ [清] 谢圣纶纂：[乾隆]《滇黔志略》，清乾隆间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 ④ 龙云、卢汉主修，周钟岳、赵式铭等编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民国三十八年（1949）铅印本。
- ⑤ [清] 黄沛翹纂：[光绪]《西藏图考》，清光绪十二年（1886）滇南李培荣刻本。
- ⑥⑧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155页。
- ⑦ [清] 王世贵修，张伦纂：[康熙]《剑川州志》，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
- ⑨ [天启]《滇志》卷24，[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 ⑩⑪ [清] 傅天祥、李斯俭修，黄元治等纂：[乾隆]《大理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清乾隆十一年（1740）补刻本，民国二十九年（1940）大理严氏铅印本。
- ⑫ [隆庆]《云南通志》卷14 杨士云《外馆驿记》，[明] 邹应龙修，李元阳纂：[隆庆]《云南通志》，明隆庆六年（1572）修，万历四年（1576）刻本。
- ⑬ 李炳臣修，李翰湘纂：[民国]《维西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修，抄本。
- ⑭⑯ [清] 陈宗海修，李星瑞纂：[光绪]《丽江府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稿本。
- ⑰⑱ [清] 吴大勳撰：《滇南闻见录》，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
- ⑲⑳㉑㉒ 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稿》，民国二十八年（1939）稿本。
- ㉓ [清] 黄沛翹纂：[光绪]《西藏图考》，清光绪十二年（1886）滇南李培荣刻本。
- ㉔㉕ [天启]《滇志》卷19，[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20、628页。
- ㉖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4册第142页。
- ㉗ [清] 范承勳、王继文修，吴自肃、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 ㉘ [咸丰]《邓川州志》卷4《风俗》，[清] 钮方图修，侯允钦纂：[咸丰]《邓川州志》，清咸丰四年（1854）杨炳钰刻本。
- ㉙ 邱宣充主编：《水目山志》，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 ㉚ [明] 陈文撰，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 ㉛㉜ [清] 王崧纂：[道光]《云南志钞》，清道光九年（1829）吉佑堂藏版。
- ㉝ [宋]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329《四裔考六》；[宋] 范成大撰，胡起望、章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7—258页。
- ㉞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 ㉟ 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
- ㊱ 田怀清：《宋、元、明时期的白族人名与佛教》，《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59—63页。
- ㊲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90《金石考十·大理国》，龙云、卢汉主修，周钟岳、赵式铭等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民国三十八年（1949）铅印本。
- ㊳ 范铸编：《三省入藏程站纪》，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34页。
- ㊴ [清] 周霭联撰：《西藏纪游》，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 ㊵⑵⑶⑷ [清] 管学宣修，万成燕纂：[乾隆]《丽江府志略》，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
- ㊶ 巴卧·祖拉陈瓦著，周润年、韩觉贤译：《〈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十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48—54页。
- ㊷⑸⑹⑺ [清] 余庆远撰：《维西见闻纪》，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办公室，1994年，第61—62、41、64、66页。
- ㊸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4页。
- ㊹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 ㊺ [清] 谢圣纶纂：[乾隆]《滇黔志略》，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 ㊻ [民国]《中甸县志稿》卷末，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稿》，民国二十八年（1939）稿本。
- ㊼ 云南省编辑组：《宁蒗县纳西族社会及其母系制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3页。
- ㊽ [清] 陈宗海修，李星瑞纂：[光绪]《丽江府志》，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稿本。
- ㊾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创世纪》（纳西族民间史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3—94页。
- ㊿ [民国]《蒙化志稿》卷15，李春曦修，梁友棣纂：[民国]《蒙化志稿》，民国九年（1920）云南崇文书局铅印本。
- ① 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页。
- ② 该文作者原稿为《宁蒗见闻录》，整理出版时更名为《永宁见闻录》。周汝诚著，郭大烈整理：《永宁见闻录》，云南省编辑组：《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
- ③ [清] 钮方图修，侯允钦纂：[咸丰]《邓川州志》，清咸丰四年（1854）杨炳钰刻本。
- ④ [明] 教滋贞修，艾自修纂：[隆武]《重修邓川州志》，明隆武二年（1646）刻本。
- ⑤ 李炳臣修，李翰湘纂：[民国]《维西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修，抄本。
- ⑥ 殷承钧纂修：[民国]《泸水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